

工農聯盟問題

吳 江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工農聯盟問題

吳 江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工農聯盟問題

吳 江 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649·737×1092耗·1/32·4 $\frac{1}{4}$ 印張·89,000字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000冊 定價：4,100元

目錄

第一章 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	一
第一節 工農聯盟是取得人民革命勝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力量.....	一
第二節 工人階級與農民的不同地位及其共同利益.....	九
第三節 工人階級在工農聯盟中的領導作用.....	六
第二章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工農聯盟.....	七
第四節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中解決工人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 工農聯盟是革命統一戰綫的基礎.....	七
第五節 我國工農聯盟所經歷的道路.....	四
第六節 我國工農聯盟的特點.....	四
第三章 實現國家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和工農聯盟.....	三
第七節 工農聯盟的新時期和新任務.....	三
第八節 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對於工農聯盟的意義.....	六
第九節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於工農聯盟的意義.....	七
第十節 商業工作在工農聯盟中的地位.....	五
第十一節 關於農業信貸和農業負擔政策.....	二
第十二節 通過共產黨加強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政治領導和思想領導.....	二

第一章 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

第一節 工農聯盟是取得人民革命勝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力量

工農聯盟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取得人民革命勝利和建設社會主義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力量，它在革命的各個時期（包括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都是必須予以高度注意的重大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曾強調指明：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公式，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農民問題的學說和工農聯盟思想在中國條件下的具體運用。

早在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德國、法國以及其他各國革命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特別注意到了農民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馬克思曾經指出：「德國全部事情，都將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為轉移。」^①恩格斯說：「社會主義政黨之奪取政權已成為最近將來的事情了。然而為了奪取政權，這一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走到鄉村，應當成為鄉

村中的力量。」「我們之所以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把以勞動爲生的小農看作對於我們隊伍的可能的補充，而且也是爲了黨底直接利益。我們能使之不真正轉變爲無產者而把他們仍然作爲農民吸收到我們這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變革底進行也就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在革命中對待農民的這一基本思想，後來被列寧、斯大林在新的鬥爭條件下，即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條件下進一步發展了。

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但是，工人階級所進行的鬥爭並不是孤軍作戰。工人階級在爲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中，首先遇到的是同盟者的問題。「而這是不言而喻的：誰想要去奪取政權並準備去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到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斯大林）如所週知，工人階級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極其廣泛的問題，除了各國工人階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廣大勞動人民理應成爲本國工人階級的同盟者以外，勞動農民就是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直接和自己在一起的最廣大和最可靠的同盟軍。工人階級想要去奪取政權，首先不能不考慮到與廣大勞動農民羣衆結成堅固聯盟的問題，並使自己成爲這個聯盟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只是在認識了和實現了這一領導權思想的時候才是革命的」（列寧）。

② 「馬恩通信集」，轉引自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四頁。

③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頁和第二八頁。

列寧早在一八九四年所寫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便初次在馬克思主義中闡明了工農聯盟的思想，指出這一聯盟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主要手段。列寧駁斥了當時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對於農民問題的冷淡和污蔑，機會主義者企圖把農民說成是沒有革命性的甚至是反動的力量，這是因為他們居心背叛馬克思主義，不準備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去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在這個時代，適時地全面地闡明了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者）與被剝削勞動羣衆（被領導者，其中主要是農民）的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這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原理。

斯大林後來在敘述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遵循列寧指示研究農民問題的經過時說：「大家都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內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開始，當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已具有了迫切的性質。同時，大家也知道：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因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因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而發生了無產階級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①

俄國工人階級正是因為在革命的各個時期，正確地解決了與農民聯盟的問題而取得了革

命勝利的。斯大林在其最後的一部偉大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把工農聯盟這一思想發揮到了更高度。斯大林指出：「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經濟法則，早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爭取爲自己開闢道路。它之所以還沒有給自己開闢出道路，還沒有獲得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這是因爲它遇到了社會腐朽力量極強烈的反抗。……因此，必須有能够克服這種反抗的力量，社會力量。在我國，找到了這種力量，其形式就是佔社會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蘇維埃政權之所以能够粉碎了舊的社會力量，而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之所以在我國獲得了發生作用的充分廣闊場所，其秘密就在於此。」^①

俄國革命的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都證實了列寧、斯大林這些論斷是唯一正確的。

這就是說，工人階級想要取得革命的勝利，想要解放社會生產力，沒有工農聯盟這個力量是不行的。

工人階級在取得革命勝利（這裏是指奪取政權）之後，其任務就是要鞏固自己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並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想要實現這個任務，不依靠工農聯盟這個力量也是完全不行的。

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所領導的政權乃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定性的條件，而工

農聯盟則是一蘇維埃政權的全部精華」（列寧）。必須不斷地加強工農聯盟、加強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的基礎力量，運用這個力量來和國內外一切敵人作鬥爭，保護國家的經濟建設，運用這個力量來發展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並按社會主義原則來逐步改組整個國民經濟，這樣才談得上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建設是把農業和農業的主人——勞動農民排斥在外的。也不可能設想，工人階級在取得政權之後，可以不必以最謹慎的態度去解決許多世紀以來所存在的農民問題。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當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被當作具體實踐問題提出並加以解決的時候，曾着重闡明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建設是工業和農業的統一這一著名原理，指出：「而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則包括了全部國民經濟，即既包括工業，又包括農業。因為，建成社會主義問題，就是組織整個國民經濟的問題，就是正確配合工業和農業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乃是工業和農業工作人員的一個生產消費組合。如果在這個組合裏面，工業與供給原料、糧食和消耗工業品的農業不協調，如果工業與農業因此而不能組成一個統一的國民經濟的整體，——那末，從這裏任何社會主義的結果都不可能獲得。所以工業與農業的相互關係問題、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相互關係問題，乃是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根本問題。」^①

列寧、斯大林在論述社會主義建設任務時不止一次地指出：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

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和最高原則，不遵守這一原則，就不能鞏固社會主義國家，就不能保證工人階級在爲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領導作用，只要我們稍稍破壞或削弱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切任務便會成爲泡影。

工人階級聯合勞動農民羣衆一起去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肯定在一國之內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主要根據之一，爲了做到這一點，列寧和斯大林曾經進行了一系列的嚴重的鬥爭，去反對各種各樣錯誤的和犯罪的意見，如認爲小農經濟在數量上佔優勢的國家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應着手剝奪農民小生產者，工人階級在建設社會主義中不可能與農民達到聯合而必然與農民發生衝突等等機會主義者的意見和主張。

爲了聯合勞動農民羣衆一起去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和斯大林曾經製訂了許多極其重要的理論原則和政策措施，如關於工人階級和貧農實行與中農的鞏固聯盟去限制富農直至消滅富農的政策，列寧的著名的合作社計劃，以及斯大林依據列寧的合作社計劃製訂出並在實際上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的理論等等。

這一切，解決了工人階級在建設社會主義中所遇到的最艱難的歷史任務：使人數最多的勞動農民階級轉上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在農業這一個過去最落後同時又最廣大和迫切需要的國民經濟部門中，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由上述可知，工人階級在奪得政權後能否鞏固政權並建設社會主義，也完全要以工農聯盟的鞏固與否爲轉移。

在社會主義既經建成以後，一切剝削階級被消滅了，構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嶄新階級的工人和農民，已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一致的條件下友好地生活和工作。正如斯大林所指出，這時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已變成了他們之間的真正的友誼，在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道路上，他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以爲這時可以不必再去關懷工農聯盟的鞏固，完成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任務可以不再依靠工農聯盟的力量，那是完全錯誤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於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工業中的全民所有制和農業中的集體農莊所有制，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利益的對立雖已消滅，但其本質差別仍然存在，工人階級與農民也仍然是兩個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階級。共產主義建設要求工業進一步緊密配合，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生產方面進行巨大的創造性的工作，通過工業生產的強大發展和集體農莊的全面鞏固和發展，最後引導到建立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生產部門，來代替兩種不同的生產部門（國營部門和集體農莊部門），將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克服城鄉間與工農業間的本質差別，建設成共產主義社會。而要完成這些任務，則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的統一行動，即必須進一步加強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之間的聯盟和友誼。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繼續推動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前進，並使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這兩個不同地位的階級最後融合成爲統一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者，達到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那種情形：「工人和農民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集團勢必消失，變成土地和工廠的勞動者，就是說，他們的經濟地位將是平等的。……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將逐漸變

成一個溶合物，變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①

這就是說，在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不僅不可以削弱，相反，它是意味着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聯盟發展中的新的高級階段，這一聯盟在社會主義獲得勝利以後，必須成爲更加鞏固、強大並能保證完成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新的複雜任務的聯盟。

由上述可以看出：不論是在革命中或建設中，工農聯盟的思想和力量，對於工人階級的事業說來，都有着頭等重要意義。儘管各國革命及在革命的各階段上，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的性質和形式有所不同（這是要隨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不同而發生差異的），但工農聯盟的思想總是隨時隨地普照着工人階級的事業，使得工人階級有力量去克服前進途中的一切困難。而農民如果不與工人階級聯盟，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幫助，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徹底的解放。

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在數量上佔巨大優勢的國家，農業人口達數萬萬，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家。因此，農民問題在我國更有其特殊重要性。毛澤東同志關於工農聯盟問題的理論，業已引導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目前正在引導着我們進一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爭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

第二節 工人階級與農民的不同地位及其共同利益

工人階級與農民（本書中所指的農民，主要是貧農和中農）是兩個處於不同經濟地位的階級，其經濟本性和勞動條件都是各不相同的，但他們之間在一定的條件下又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就是這種共同的利益使得他們能够聯合起來而進行共同的鬥爭。農民之所以能够成爲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長期的同盟軍，就是因爲在革命的各個時期，他們的共同利益總是佔壓倒地位的緣故。

認識工人階級與農民間在革命各個時期的共同利益，找出他們的共同點，是爲了使我們認識工農聯盟的可能性及懂得這種聯盟的必要性，堅定我們對於工農聯盟的信念。而認識工人階級與農民的不同地位及其不同性格，找出他們在革命的各個時期和在各種問題上所存在着差別或矛盾，是爲了使我們懂得在革命的各個時期怎樣去和農民實行聯盟，使我們懂得在各種問題上應當對農民採取怎樣一種政策，才有利於建立和鞏固雙方的聯盟，而不致破壞雙方的聯盟。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工農聯盟所採取的態度，就是從這種分析出發的。

那末，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不同地位及其共同利益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工人階級就其經濟地位來說，是與社會上最先進的社會化的大生產相聯系的勞動階級，它之作爲階級是一年一年地增長着的。工人階級在資本家的統治下喪失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工人階級爲了求得解放，必須廢除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從而就必須消滅一切剝削，解放全體勞動者。這就是工人階級的世界歷史性的革命作用，就是工人階級所以能够成爲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爭取解放的鬥爭中的代表者的理由。工人階級由於它的無產者的地位，所以它是最革命的，又由於工人階級的大生產勞動條件的緣故，他們也最容易組織起來，較之其他任何勞動階級都更能進行團結一致的、自覺的、有組織的鬥爭。就其階級覺悟來說，工人階級是一個比其他勞動者覺悟更高更有遠見的階級。所以工人階級是現代社會的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革命離開了它的領導是不行的。

農民階級則是私有的個體經濟利益的代表者，是與小商品生產相聯系的一個階級。就其經濟地位來說，突出地表現了它的兩重性：一方面農民是勞動者，他們受地主和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壓迫，從這點上說，農民是和工人階級相接近的，有接受社會主義的願望；但另一方面，農民又是私有者、小商品生產者及糧食出賣者，他們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因此就必不可免地要從自己的隊伍中分泌出資本家、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剝削分子來，從這點上說，農民又是和資產階級相接近的，他們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自發願望。所以按照農民的經濟地位說來，他們只是在一定條件下才是革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如果他們是革命的，那是因爲他們行將落入無產階級的隊伍或是因爲他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鬥爭。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這個階級必日益分化，絕大部分破產了，跑入了無產階級的隊伍（一部分到城市做工，一部分成了鄉村的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即佃僱農與貧農）；極少數發財了，加入了資產階級的隊伍（富農）；一部分處在動搖

不定而且大半總是臨近破產的中農地位。農民的這幾種不同的階層，對革命的態度是各不相同的。一般地說，僱農、貧農和中農（在中國革命勝利前，他們佔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總是要爲改善自己的生活 and 地位而鬥爭的，但由於他們所處的經濟地位的限制，不可能獲得行動的組織性和必要的政治覺悟，他們不可能成爲政治上的獨立的力量。然而由於農民在勞動中的地位和人數的衆多，使他們在現代社會革命中有着很大的作用，革命要離開了農民是不可能獲得勝利的。

從上述工人階級與農民的一般不同情況和一般特點看來，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是建築在怎樣一種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呢？這種基礎又是否鞏固呢？爲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分別不同的時期來觀察一下。

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時期。這就是說，政權還在剝削階級手裏，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爲當權的階級。我們知道，在任何剝削階級當權的國家裏，勞動農民都不可能擺脫貧困和破產的威脅，而是每日每時都在實際遭受着這種威脅。「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業、商業、信貸制度的整個發展進程使鄉村遭受城市剝削，使農民遭受剝奪，使大多數農村人口遭受破產。」○中國的情況更不必說了，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致大批地破產，他們過着飢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

利的的生活，其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少見的。勞動農民爲了擺脫自己的這種境遇，除了和工人階級一道並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進行鬥爭以外，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

列寧對工人階級與農民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不同地位及其共同利益，曾做過如下分析：「農民除包含有很多半無產者分子外，同時又包含有小資產階級分子。所以它也不穩定，而使無產階級必須團結成爲一個階級性十分嚴格的黨。但農民底不穩定性與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根本不同，因爲現在農民與其說是需要絕對保存私有制，不如說是需要奪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農民雖不會因此而成爲社會主義者，雖不會因此而停止其爲小資產階級，但它能成爲完全和最急進擁護民主革命的力量。」^①斯大林在總結俄國革命的經驗時也曾指出：「因爲當時我們黨探得了，找到了一個可把農民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與全國共同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使前者服從後者，而結果是農民認爲可以接受並且有利的標準。所以農民雖有其非社會主義的性質，還是跟着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行進了。」^②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部經驗，也證實列寧和斯大林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由於大敵當前，由於工人階級竭力協助農民爭得土地和自由，而又並不因此要求其成爲

①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四三頁。
②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四五頁。

社會主義者，在這種時候，工人階級與農民間所存在着的一點差別或矛盾，便自然而然地退居到了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雙方的共同利益超過了並且掩蓋了一切。

在工人階級奪得政權並且領導國家建設的時期。這個時期，工人階級已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其任務是要着手把國家引導到社會主義社會去，即改造全部國民經濟，要使得國家工業化，並對農業和手工業及其他非社會主義成分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僅是改造農業的技術基礎，同時還需要改造農村的社會經濟關係，即人和人在生產中的關係，使細小的個體的農民經濟改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大經濟，使農民的私人所有制改變為集體所有制，使個體農民改變為集體農民。過去，工人階級保護農民小私有者的地位使之免遭剝削和破產，並竭力幫助其爭得土地，並不是企圖使農民永遠成為小私有者。「如果我們給予諾言使農民那怕有一點藉口去推想我們的意思是長期保持零細土地所有制，那末這並不僅對於黨而且對於小農自己也是最壞不過的倒幫忙。」（恩格斯）因為小私有者的地位，終不免要使農民發生貧富分化，而使大多數農民遭受貧困與破產。所以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是要繼續引導農民前進，幫助全體勞動農民去爭得建立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普遍富裕的生活，以達到真正的完全的解放。這就是說，這時我們必須要求農民逐步變成為社會主義的生產者，使之接受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

另一方面，農民本身也發生了某些變化。這時候的農民，如斯大林所指出，「已不是飽受喪失土地的驚恐，決心犧牲一切來擺脫地主壓迫的備受折磨的舊農民，而是一個自由的積